

日本后现代与 知识左翼

修订版

Post-modern and
the Intellectual Left in Japan

Revised Edition

赵京华 著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SDX
&
H-Y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赵京华 著

日本后现代与 知识左翼

修订版

Post-modern
and
the Intellectual Left
in Japan

Revised Edition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 / 赵京华著. — 修订版.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8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978-7-108-05878-2

I. ①日… II. ①赵… III. ①后现代主义—研究—日本
IV. ①B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3874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 数 265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5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学术委员会：

季羨林 李学勤
(主任)

李慎之 苏国勋

厉以宁 陈 来

刘世德 赵一凡
(常务)

王 蒙

责任编辑：孙晓林
曾 诚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从1994年创始至今，
二十年来，推出了近百种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论著。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专家组成编审委员会，
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评审遴选，定出每辑书目。
丛书保证学术品质，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审制度。



展望未来，
本丛书将一如既往，稳健地推出新著，
为中文学术的繁荣发展竭尽绵薄。

Post-modern and the Intellectual Left in Japan

Contents

- Introduction Post-modern Criticism in Japan
- Chapter 1 In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Marxism:
Karatani Kojin's Critic Practice in His Early Period
- Chapter 2 Returning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Karl Marx:
Karatani Kojin's Critic Practice in His Late Period
- Chapter 3 Japan and Asia in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Hist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Koyas Nobukuni's Knowledge Archeology in Modern Japan
- Chapter 4 Textual Deconstruction, Cultural Politics and Real Politics:
Komori Yoichi's Process from Textual Analysis to Political Engagement
- Chapter 5 "The Face of Otherness" and "Forgotten Caves":
Takahashi Tatsuya's Philosophy of Deconstruction and Its Cultural Resistance
- Chapter 6 How Do Intellectuals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
New Trend of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 Leftist Group in Japan
- Postscript (2007)
- Postscript (2016)
- Main References
- Index

| | | |
|--------|--|-----|
| 导 言 | 日本后现代主义批评 | 001 |
| 第 1 章 | 在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柄谷行人的前期批评实践 | 029 |
| 第 2 章 | 重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柄谷行人的后期批评实践 | 082 |
| 第 3 章 | 思想史和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日本与东亚 ——子安宣邦的近代日本知识考古学 | 139 |
| 第 4 章 | 文本解构、文化政治与真实政治 ——小森阳一从文本分析到政治介入的历程 | 208 |
| 第 5 章 | “他者的面容”与“忘却的洞穴” ——高桥哲哉的解构哲学观及其文化的抵抗 | 254 |
| 第 6 章 | 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公共事务 ——日本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的新走向 | 291 |
| 后 记 | | 318 |
| 新版后记 | | 320 |
| 主要参考书目 | | 323 |
| 索 引 | | 339 |

日本后现代主义批评

随着福柯、利奥塔尔、德里达等的相继谢世，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和人们思想关注焦点的转移，以解构主义运动为核心的后现代思潮，在上世纪 70、80 年代盛行于西方并波及世界各地之后，逐渐呈现出衰微的趋势，其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今天，面临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人们在寻求新的批判理论和阐释世界的方式。而我认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期，有必要回头重新检阅后现代的思想方法。实际上，虽然作为一种运动和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其兴盛发达的时期已然过去，但其概念分析工具和知识话语要素，如结构/解构、文本/事件、权力/话语、中心/边缘、差异性/同一性、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等等，都已经播散到我们的理论和话语实践当中，留下了难以消去的痕迹。它至少使当今的知识生产不可能再毫无怀疑地相信工业革命以来的启蒙理性，及其整套话语体系的普遍合理性，包括我们一向确信不疑的真理、主体性、进步、革命、解放、发展，乃至建立在进化论时间观基础上的

现代性叙事。因此，重新检阅这些思想和概念工具，将有助于推动新的批判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伴随后现代思潮衰微而出现的，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原本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领袖，重新回归马克思的社会斗争理念（德里达）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柄谷行人）、差异政治学（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后殖民批判等）以及自由主义左翼传统（罗蒂），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旧左派乃至60年代“新左翼”的知识左翼，他们内在于学术的文化政治关怀和基于后现代立场的社会参与，成为当今抵抗新自由主义保守政治和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思潮蔓延的一股重要批判力量。这当然与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冷战格局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急遽瓦解，各国传统的左翼包括政党政治中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等抵抗力量的普遍衰退，造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和保守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关。这个新的知识左翼在实际的“文化政治”实践和“真实政治”的参与中，提出了一些有别于以往传统左翼的抵抗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制度体系的批判理论、斗争策略及组织社会运动的方案。他们的实践能否把学院知识与公共事务的参与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改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批判势力日益衰退的局面？这些问题对于不单是要了解后现代主义思想，而且注意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参与的人们来说，都是值得关注的。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也便是本书在考察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后现代主义批评时的主要关注焦点和问题意识。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及理论批评的发展具有自己的东亚特征和本土文化背景，但是，它并非封闭于文化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生产或单纯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毋宁说是具有世界同时性而首先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发

源于“68年革命”并在结构主义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相仿佛，20世纪60年代反抗“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社会斗争和学生造反运动，也是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想产生的直接背景和社会根源，而运动中对青年学生发生广泛影响的以“宇野经济学”和“广松理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及其70年代在感性主体哲学研究（中村雄二郎）、文化人类学（山口昌男）和文本批评（前田爱）等方面具有结构主义倾向的学术思想追求，成为80年代日本后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前奏。以理论批评家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等为主的后现代批评，经历了80年代最活跃的发展时期，到了90年代中期，包括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后现代青年”，开始出现了从非政治化的“主体解构”“文本批评”向“左翼批判”转向，即重新回归社会斗争和关注“真实政治”的趋势，其中一部分又形成了一个“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而这种“向左转”的状况，与90年代初西方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领袖开始重新关注马克思或者社会政治问题，并出现学院知识精英重返社会斗争和公共事务的新趋势遥相呼应。

因此，我们可以把日本后现代批评放到具有世界同时性的整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视角之下来观察，从中思考其起源、方法论特征、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其思想史意义。同时，通过剖析后现代主义由“文本解构”向文化政治和社会批判“转移”的逻辑理路，加深对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抵抗新自由主义保守政治的普世化（全球化），如何为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而发挥应有职责的认识。这样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需要在方法论和叙述形式上采取相应的写作策略。我在本书中力争避开一般的以线性时间为主的历史叙述，而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在解读几位至今依然活跃于日本文化思想界的代表性批评家和理论家的思想实践时，尽可能地把他们的学术

思维和方法论指向与具有世界同时性的整体后现代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同时充分注意到他们在日本的特殊语境下其实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就是说，以具体的特殊性来呈现一般的普遍性问题，并通过“个别”进入历史现场，是我所坚持的主要写作策略。如果单纯从“特殊性”的视角来谈日本，只会把其后现代主义定位于西方普遍性之下，成为一个从属的亚系统，将造成其丰富的思想史意义被消解掉的后果。回避一般线性时间的历史叙述，还因为日本的后现代批评，作为一个流动的至今依然在发展变化着的思想潮流，远远不能用预设的理论前提和模式化的历史叙述来框定。另外，我还注意在“个案”分析中力图透过文本细读以形成对话的态势，在对话中呈现问题的多面性，以触摸日本学者、批评家其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想背后的文化政治诉求和知识伦理关怀，从而获得对普遍性问题的深层讨论，以避免仅仅局限于对日本一国问题的描述。

二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时，曾经提出“晚期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概念，用以说明社会生活阶段的变化和断裂，造成后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的必然趋势。^①这实际上涉及社会学家们所讲的社会转型，即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普遍从工业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移。这种社会转型成为带动起思想文化艺术和

^① 参见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文版第418页，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深入了解日本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需要首先从其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观之。

战后日本的经济变动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是社会混乱与经济重建时期。在美国占领下日本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为其后的经济活动奠定了基础。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则借为美国生产军事工业“特需”的机会，迅速完成了战后的经济重建。从 1955 年开始到 1973 年，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70 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下降到 19.4%；第二产业人口的比重则达到 34% 强；第三产业人口在 70 年代上半期已经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1971 年日本执政党决定其通商产业政策时，强调产业结构从化学重工业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1980 年，日本随同联邦德国（1966）、法国（1975）相继进入农民只占人口 10% 的城市化社会。而 1973 年成为经济社会变化的标志，在于这一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 年 10 月 6 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阿拉伯国家，为使对以战争向有利于阿拉伯世界的方向发展，声明大幅度削减原油生产和大幅度提高油价，多年来依靠中东供应大量廉价石油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发达国家，其经济繁荣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以此为契机，日本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调整了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高速增长宣告结束，开始全面进入大众消费社会。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在“史密斯协定”^①基础上，1973 年日美两国实现了汇率的固定制向浮动制的转变。随着日元的升值和 GDP 的增长，日本从 1973 到 1985 年开始进入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这也便是

^① 1971 年 12 月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斯博物馆，由十国财长一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大众消费社会全面发展的阶段。1985年以后日元升值已然稳固下来，此后转移到泡沫经济和长久的经济萧条时期。日本的大众消费社会和由此而来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正是在上述经济社会发展变动的背景下产生的。^①

在整个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人沉浸在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狂喜之中。1970至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0%。1986至1987年，东京的不动产价值连续两年翻一番。1986年开放境外金融服务之后，日本迅速成为债权国，一年之内便拥有了美国30%的债权。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1989），敢于以蔑视的态度质疑美国的各项贸易政策，其背景就在于上述大众消费社会的迅猛发展和惊人的财富增长。然而，时间进入到90年代，这种盛况急转直下而出现长期的经济萧条。1990年9月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价值在四天之内下降了48%，1993年地产泡沫崩溃，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资产贬值。日本的银行和经纪公司开始背负起6万亿美元无法收回的地产和建筑债务。^②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日本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态和一般国民的思想情绪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战后不久的1955年所形成的、保守政党（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与革新政党（在野的社会党、共产党等）相互制衡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模式，即“55年体制”彻底崩溃，政党政治中左翼批判力量的迅速衰退，客观上造成了右翼政治的上升并成为国家决策中的主导势力；另一方面，受到经济萧条的冲击，一般日本国民的思想情绪开始出现保守化的倾向，成为此后排外的民族

① 以上参见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4卷及书后附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中文版，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 参见〔美〕约翰·内森《无约束的日本人》中文版，周小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横行一时的温床。

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向左转），与上述经济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有着直接内在的联系。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转型，促成了作为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兴起，那么，80年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全盛期则是其突飞猛进的辉煌阶段，而90年代前期的经济衰退和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又是一些后现代思想的代表人物开始转向“左翼批判”，甚至走出学院突破“文化政治”的场域，直接参与“真实政治”斗争的主要社会因素。当然，日本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也有着自身内在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语境。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60年代社会革命的终结和日本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斗争，特别是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是一个遍布全球的世界性现象，它以反社会、反制度、反文化的过激姿态，实现了资产阶级反抗自身的一次“内部”革命。由于其斗争形式的过激，这场革命没能维持多久便消失于资本主义新一轮繁荣发展（后工业阶段）的历史场景背后而被人们所渐渐忘却。但是，革命本身所要求的激进参与民主和谋求另类生活方式的理念，对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的制度、文化所表示出来的怀疑，以及过激的行动方式所带来的挫折，都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一般认为，70年代以后，以法国为发源地广泛兴起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直接起源于“68年革命”，福柯、利奥塔尔、德里达等人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与“68年革命”的对话。而社会运动终结后，那种被压抑和扭曲的革命情结则凝结成了“后现代主义”反思“现代性”，解构“启蒙理性”的理论批判动力。

日本的60年代社会革命，当初虽然有“安保斗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但到了1968年前后的“大学纷争”阶段，则显示出

了与西方“68年革命”的同时代性。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促成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是日本“大学纷争”的主要起因。1968年相当于上述日本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即高速发展的末期，那一年日本的GDP规模已经上升到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位，十年来高速发展带来的财富，使人们开始从专注劳动和经济生产转移到关注更广泛的社会与个人问题，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1968年学生运动的主体即在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是出生于战后没有经历过战乱的一代，其人口比例占到了日本整个人口的一半。他们在蒸蒸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长期长大成人，对战后准军事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秩序抱有抵抗情绪，于是，突然之间，他们上演了一场激烈反抗父辈们所一手构建的管理社会之制度与规范的革命。而最后以1972年震惊全日本的“联合赤军事件”的爆发宣告其终结的这场革命，给此后日本的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今天活跃于各个领域中的坚一代（“后团块世代”）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作为学术、思想和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也是直接起源于60年代社会运动后其文化历史语境的转移。

这个文化历史语境的转移，可以透过20世纪日本左翼批判的最大理论源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与挫折的过程，来加以认识和考察。因为，随着20年代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同时传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理论，还是一种作为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和“具有逻辑性结构的思想”，^①即哲学方法论而降临于日本思想界，其巨大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6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大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论争，在此基础上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成立。但

①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第79页，东京：岩波书店，1961。

是，建立伊始的日共，在稍后的关东大地震时便受到政府的严酷压制，山川均不得不暂时放弃组织先锋政党的计划，转而主张先解散共产党重返工会运动。另一方面，在西欧接触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福本和夫回到日本，以“分离/结合理论”强调建立先锋政党的必要性。结果，1925年前后所谓“福本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有了自己的发展，形成了对后来影响久远的“讲座派”和“劳农派”两军对垒的局面。^①进入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白色恐怖的加剧而遭到严重挫败的日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以狱中不曾“转向”的德田球一为核心获得了重建。50年代前期，日共曾提出新的“两阶段革命论”，即战后追随美国的日本处在被占领的地位，共产党首先需要“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然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其中还包括试图推行武装斗争的强硬路线。这种理论和路线当然不符合那时日本社会的实际状况，也未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在党出现分裂危机后的1955年，经过总结教训最后恢复了统一。1958年，宫本显治体制正式确立起来，此后的日本共产党始终对左倾冒险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其“宫本体制”一直延续到90年代。

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于战前曾风靡整个思想理论界，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和介入实际政治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进入60年代，与社会运动和学生造反同时发生的从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以及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使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外部社会变迁的挑战和内部的思想危

^① 所谓“讲座派”之称来自《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一书书名，该阵营的理论家基本上依据共产国际的纲领，强调日本社会仍残留着半封建的要素。另一方的“劳农派”则主张江户时代就有了资本主义的因素，故现阶段需要的是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斗争及社会主义革命。

机。社会转型意味着日本共产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斗争理论（共产党先锋队，大众启蒙，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针对资本家及其制度的暴力革命等）已经失去了直接的革命对象和目标，而作为资产阶级反抗自身的“内部”革命，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于是，在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从趋于保守的日共内部分化出来的“新左翼”开始登上社会运动的政治前台，直接参与领导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到了1968年的“大学纷争”阶段，其直接担当指导斗争的是被称为新左翼的“全共斗”（全国学生共同斗争会议），而共产党及其民主青年同盟却站在学生斗争的对立面，成为维持秩序、阻止学生的反动势力。当然，60年代社会运动中的“新左翼”也因“小儿幼稚病”式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使运动走到了危机的边缘，其极端的例子便是1972年“联合赤军”的“浅间山庄事件”。^①结果，日本共产党和“新左翼”最终都走向了急遽衰退的末路。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西方为“68年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的不是正统的各国共产党理论，而是新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一样，在日本，日共中并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1933—1994）的“广松理论”，和经济学家宇野弘藏（1897—1977）的“宇野经济学”成了1968年学生造反的重要理论依据。广松涉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细致调查，发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与后期马克思思想之间存在着“断裂”，他以自创的“物象化”概念区别早期马克思带有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物化”说，来解释后期马克思对现存制度的批判

^① 参见本书第1章“在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柄谷行人的前期批评实践”的相关部分。